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体、私营经济政策的演变探析^{*}

崔利萍

(山西大学商务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31)

〔摘 要〕怎样对待个体、私营经济,这是一个长期困扰中国共产党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新中国成立头30年,个体、私营经济经历了多次波折,最终无法摆脱被消灭的命运;改革开放新时期,个体、私营经济新生并壮大。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的个体、私营经济政策失误原因,主要是对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论”及“过渡时期理论”的曲解,对资本主义认识的误区以及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判断的失误所致。新中国头30年对个体、私营政策演变的基本经验教训是,必须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深化对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研究,正确认识中国国情,充分认识个体、私营经济存在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

〔关键词〕个体经济;私营经济;政策演变;失误原因;经验教训

〔中图分类号〕F121.2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6285(2012)07-0030-06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个体、私营经济政策的演进

(一)肯定基础上的利用限制政策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了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中国共产党对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采取了利用和限制的政策。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针对当时全国性工商业困难的局面调整了政策:放松银根,刺激需求;调整税收,简化税目;调整公私关系,改善个体私营工商业的经营环境;调整劳资关系,提出用协商的方式解决劳资矛盾;公布产销信息,引导工商业者的生产经营。上述政策扩大了就业,活跃了市场,增加了财政收入;同时解决了个体私营工商业面临的原料、市场、资金问题,民族资本家感慨“共产党的政策变好了,今后买卖好做了,利虽不大,可是稳当”^[1]。

1951年,中国共产党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由于采取了群众性阶级斗争的方式,因此各地相继出现市场萧条、物价下跌、交易停滞、劳资关系紧张的情况。为解决这些问题,1952年对个体私营工商业政策进行了第二次调整:扩大对私营工业的加工订货及收购,允许私营商业适当扩大批零差价和地区差价,缓和了公私关系,扭转了萧条局面,工商业者的生产经营积极性回升。

概括地说,新中国成立头三年,中国共产党对个

体、私营经济的认识总体上是清醒的,允许个体、私营经济存在并发展,使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并超过战前最高水平。

(二)否定基础上的逐步消灭政策

1.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国前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曾经形成共识:搞一段时间新民主主义,待条件成熟后再实行国有化和集体化。但随着形势发展,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变化,1953年6月正式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12月公布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提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2]

到1953年底,私营工商业的多数已分别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公私合营户数由1949年的193户增长到1036户。1954年9月,国务院制定了《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对规模较大较重要的905家工业企业进行合营。合营后的私营工业产值占国家工业总产值的比例下降到24.9%。

1955年夏,毛泽东批评邓子恢“右倾”、“像小脚女人”,在全国掀起了农业合作化高潮。10月,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我们的目的是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小生产绝种。在

^{*} 山西大学商务学院科研基金资助项目(SZ2010040)“独立学院‘形势与政策’课专题教学研究”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12-05-17

〔作者简介〕崔利萍(1976-),女,北京人,山西大学商务学院思政部教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这方面,良心少一点好。”^[3]

由于不断加快社会主义改造速度,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提前完成。到1956年底,99%的私营工业完成了所有制改造,公私合营工业户数共3.3万户,职工243万人,总产值191亿多元;私营商业82.2%实现了改造^[4]。

2. 完全消灭个体、私营经济的政策。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由于私营经济所剩无几,不利影响暴露出来。1956年12月毛泽东说“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5]陈云在八大上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观点,个体工商业曾一度恢复和活跃。

但好景不长,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提前完成和国际形势的变化,毛泽东于1958年掀起了“大跃进”运动。虽然从郑州会议开始纠“左”,但随着1959年庐山会议后期展开的“反右倾”斗争,个体、私营经济政策再次发生逆转,导致严重经济困难,人均粮食消费量由1957年的409斤降至1959年的366斤、1960年的264斤,大饥荒蔓延全国。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中央被迫再次调整政策,1964年全国小商小贩恢复到247万人,其中个体商贩50多万人^[6]。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使残存的个体、私营经济遭受毁灭性打击。“文化大革命”期间,明令取消家庭副业、集市贸易,“割资本主义尾巴”,打击“小生产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

(三) 重新肯定基础上的鼓励、支持和引导政策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期,个体、私营经济重新崛起、迅猛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认真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结果。

1. 承认个体、私营经济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人民公社制度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指出: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7]。1981年国家农委《关于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的报告》指出:“生产队要根据当地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的状况和生产习惯,推行在统一经营的前提下,按专业承包、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组织各种形式的专业队、专业组、专业户、专业工。同时还要通过订立合同和其它形式鼓励和支持社员个人或合伙经营服务业、手工业、养殖业、运销业等。凡是适宜社员个人经营的项目,尽量由农户自己去搞,生产队加以组织和扶助”^[8]。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了农户对

土地的使用权和生产经营的自主权,激发了农民压抑已久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增长,部分农民开始从土地中转移出来,于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以商品生产为特征的专业户、家庭手工作坊、个体工商户欣欣向荣。

“文革”以后,城市一方面经济萧条,居民吃穿用困难;另一方面,上千万无业人员和返城知青使就业成为严重问题。从1979年起,国家鼓励城镇个体经济发展,“在国家统筹规划和指导下,实行劳动就业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和自谋就业相结合的方针”。1981年,全国注册登记的城乡个体工商户计183万户,从业人员227万人,资金5亿元,销售总额或营业收入达10.9亿元。

1982年中共十二大报告指出“鼓励劳动者个体经济在国家规定范围和工商行政管理下适当发展,作为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只有多种经济形式合理配置和发展,才能繁荣城乡经济,方便人民生活。”同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首次以法律形式肯定了城乡个体经济的合法地位。

个体经营规模的扩大必然带来雇工。中国共产党对雇工采取了慎重的态度,促进了私营经济的发展。到1987年,全国私营企业已达22.5万户,雇工超过360万人。1987年十三大报告指出“实践证明,私营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有利于促进生产力,活跃市场,扩大就业,更好地满足人民多方面的生活需求,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9]1988年,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在“宪法”中正式确立了私营经济的合法地位。

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个体、私营经济重新处于徘徊状态。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在[1991]第十五号文件中指出“私营经济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存在和发展”,“对现在的私营企业主,不应和过去的工商业者简单的类比和等同,更不能像50年代那样对他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10]。

2. 进一步肯定个体、私营经济的一系列政策。1992年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1992年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个体、私营经济进入了第二个高速增长期。1997年底私营企业发展到96.1万户,从业人员1349.3万人,注册资金5140.1亿元,产值3923亿元。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11],将个体、私营经济由“制度外”纳入“制度内”,意味着个体、私营经济不再是可有可无,而是不可缺少、无可替代的经济成分。

1999年九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认了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和作用。

2002年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指明了各类市场主体的平等身份,放宽了民间资本的发展空间,强调个体从业者、私营企业主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一切合法的非劳动收入都应该得到保护”。十六届三中全会,胡锦涛总书记提出“放宽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非公有制企业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外贸等方面,与其他企业享同等待遇。”^[12]

二、新中国成立后个体、私营经济政策发生失误的原因

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体、私营经济的兴衰沉浮,探究建国头30年中国共产党个体、私营经济政策曲折的原因,大致可概括为以下三方面:

(一)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偏差

个体、私营经济政策失误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完全摆脱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态度,简单照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原则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

1.对马克思“不断革命论”的误解。针对欧洲1848年革命,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都消灭掉,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直到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里的时候为止。”^[13]马克思、恩格斯的“不断革命论”的前提是,社会主义在西欧资本主义内部已经成熟,具备了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可能。但是后来,恩格斯意识到欧洲大陆的经济状况还远没有达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因此19世纪90年代恩格斯实际上已经放弃了他和马克思曾经主张的“不断革命论”。

回顾历史,新中国成立头三年由于贯彻《共同纲领》,对个体、私营经济采取利用和限制的政策,发挥了多种经济成分的积极性,因此国民经济迅速

恢复。但由于不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不断革命论”,认为民主革命应不间断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因此毛泽东1953年就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实践证明,让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绝种”、过早结束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想法,不仅在20世纪50年代是错误的,即使在今天乃至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不正确。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毛泽东又将“不断革命论”运用到社会主义建设中,主张穷过渡、乘热打铁,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在城镇对残存的个体、私营工商业采取更为严厉的政策。在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1965年又错误地提出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66年最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指导下,农民的自留地、家庭副业统统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成为消灭的对象。

综上所述,新中国头三十年党的个体、私营经济政策的曲折与毛泽东简单理解和应用马克思“不断革命论”有关。

2.对马克思“过渡时期理论”的曲解。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转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14]

斯大林称马克思“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理论为“小过渡”理论,与之对应的“大过渡”理论则把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视为过渡时期。

毛泽东自己曾经主张“小过渡”理论,认为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标志着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在1957年反右斗争后,毛泽东对过渡时期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尚未完成,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巩固,所以要“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之后他又以中国社会还存在非公有制因素,以城市资本家还拿定息,农村还有一小部分私人所有制的生产资料和私人活动的初级市场为由,认为“我国现在还处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说:一种说法是,过渡时期包括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也包括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另一种说法是,过渡时期只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

主义。究竟怎样的说法才对,要好好研究。而在经他修改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则明确提出“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以前,都是属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都是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最终,毛泽东曲解马克思过渡时期理论,把过渡时期同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相混淆。按照这种理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是同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进行斗争。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遭遇了严重挫折和曲折。

(二)对资本主义认识的误区

毛泽东曾经正确地主张中国革命应该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阶段,要发展私人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创造条件。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曾认为“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或者更有利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太少了。”^[15]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毛泽东指出:现代工业大约只占国民经济百分之十左右,农业、手工业则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在中国革命时期内和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16]“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利用城乡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向前发展。”^[17]

然而,毛泽东的上述正确认识自己却未能坚持下去。从1953年总路线宣传提纲可以看出,此时的毛泽东已经认为私人资本主义和个体农业、手工业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不利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现。进而提出“使资本主义绝种”、“使小生产绝种”的过激观点。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发动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和改善农民生活的一些正确政策和措施被指责为“资本主义倾向”,包括指责邓子恢关于农村工作“三自一包”的正确主张为“修正主义的国内纲领”,批评李维汉关于统战工作的正确意见是“向资产阶级投降”,把经济没能迅速发展归结为社会主义革命、反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斗争进行得不彻底。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个体、私营

经济政策的曲折,其根本原因是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在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急于消灭私有制。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总结历史经验指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仅是对立的关系,而且还是继承的关系,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资本主义的遗产之上,必须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引导其健康发展。

(三)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判断失误

个体、私营经济政策历经波折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对社会主要矛盾判断失误导致党的中心任务偏离了正确轨道。

中共八大分析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社会主要矛盾,指出阶级斗争仍然存在,但“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18]因此中心任务就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但1956年东欧形势的变化,特别是1957年错误发动的反右派运动,使毛泽东头脑中本就没有放松的阶级斗争这根弦又紧绷起来,并改变了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他在1957年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一错误的政治估量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对个体、私营经济的政策产生了严重的负面作用,以至毛泽东认为局部的阶级斗争已经无济于事,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文化大革命。

综上所述,毛泽东错误地改变了中共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是造成个体、私营经济政策失误的又一个主要原因。

三、新中国个体、私营经济政策演变经验教训及启示

(一)必须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随着实际生活的变化而不断发展。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像马克思预见的那样首先在西欧、北美等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爆发,而是首先发生在俄国、中国等相对落后国家,所以马

克思消灭商品和货币、实行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的原则设想并不能立刻完全付诸实施。

由于长期以来简单照搬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脱离了国情,最终导致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严重挫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逐步破除了对社会主义的简单化认识,个体、私营经济获得了迅速发展。实践证明,只有走出教条式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误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实践中大胆探索和创新,才能制定出符合中国实际的个体、私营经济政策。

(二) 必须深化对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研究

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证明,搞社会主义必须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问题。而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又必须搞清楚什么是资本主义,学会借鉴和利用资本主义的积极成果。

马克思批判自由资本主义,由于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两极分化严重,因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处于严重对立状态,经济危机不断。但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已经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在股份公司中,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19]493}“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这个矛盾首先表现为通向另一种新的生产形式的单纯的过渡点。”^{[19]495-496}私有财产已“不再是各个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19]494}。而在马克思恩格斯去世后,股份制迅速完善扩张。股份制,一方面保留了个人的财产所有权,因而具有很强的资本增殖动力;另一方面产权主体逐步社会化,增强了资本的社会属性,缓解了私人占有同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

股份制的发展,不仅使生产力日益社会化,而且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使用日益社会化,利润的分配也出现了社会化的趋势,资本主义内部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端倪。如,国家通过征收高额累进税和遗产税用于教育、医疗、交通、科学设施等公共事业,用于日益完善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这些措施保证了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需求,促使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逐步缩小。由于资本主义

内部不断孕育、生长出社会主义因素,因此不断焕发出新的活力。

综上所述,要消灭资本主义,首先要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的积极因素。像中国这样相对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最便捷途径就是向资本主义学习。

(三) 必须正确认识中国国情

毛泽东曾指出“认清中国社会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依据。”^[20]新中国头30年个体、私营经济的兴衰沉浮与对中国的落后状况、对改变这种落后状况的艰巨性、长期性缺乏清醒认识有直接关系,因此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追求“一大二公”、“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以为单凭群众运动就可以使生产力在短期内急剧提高。

鉴于在国情认识上的失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把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水平低和发展不平衡作为初级阶段的主要特征。十五大明确提出:从五十年代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下世纪中叶现代化基本实现,至少一百年都属于不可逾越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综上所述,从中国国情出发就不能否定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

(四) 必须充分认识个体、私营经济存在的历史合理性、必然性

第一,个体、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提是经济主体的多样化。没有经济主体的多样化,就没有市场经济。正像已故著名经济学家董辅初先生所说:“……不可能设想限制民营经济的发展而能顺利地发展市场经济。”^[21]

第二,个体、私营经济具有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产权特征、经营机制和运行机制。由于个体、私营经济有着清晰的产权主体,拥有完全独立的经营自主权和决策权,因此具有较高的经济效益。由于产权关系清晰,因而个体、私营经济具有利润最大化和资本增殖的冲动,同时产权主体也必须承担相应的风险和责任。这种内在动力与外在压力形成的比较完善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符合市场经济等价交换、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原则。个体、私营企业是以市场为导向的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能够灵活运用供求、价格的市场机制,较好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状况,调整经营决策和要素组合,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第三,个体、私营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具有互补关系。公有制经济,由于生产资料和财产为劳动者共

同所有,因此可能直接为广大劳动者的共同、长远利益服务。但由于公有制的资产占有关系是间接的,任何社会成员都无法实现直接的占有权,所以劳动者对资产的关切度比较低。更由于公有资产的使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委托的管理者个人的思想觉悟、责任心、能力,如果再加上政府不恰当、不合理地干预企业事务,那么公有制经济的资产常常不能高效使用。而个体、私营经济,由于生产资料和财产的经营效益与所有者的利益直接相关,其经营体制和经营机制能有效地保障所有者利益的实现,因此所有者对财产的关切度更高,责任心、积极性更强,更能适应市场变化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综上所述,个体、私营经济在当今世界、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内依然有存在和发展的根据和理由。否认个体、私营经济的历史必然性、合理性,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际生活中是行不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能重蹈曾经的历史覆辙。

[参考文献]

- [1] 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山西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2: 49.
- [2]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700-701.
- [3] 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198-199.
- [4] 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央卷(下)[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 1340-1358.
- [5]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433-434.
- [6] 当代中国商业,上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94.
-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7: 24.
- [8]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2: 743.
- [9]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2.
- [10] 吴序光.风雨历程——中国共产党认识与处理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问题的历史经验[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541.
- [11]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20.
- [12]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 466.
-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68.
-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14.
- [15] 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322-323.
- [16]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430.
- [17]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431.
- [18]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1956-09-27)[EB/OL].http://www.gov.cn/test/2008-06/04/content_1005260.htm.
-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 [20]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33.
- [21] 董辅初.中国民营经济探索之路[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6: 18.
- [22] 吴江.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沟通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 [23] 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 [24] 于光远.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 [25] 张远新.建国后我党对个体私营经济政策的演变及其历史经验[J].社会主义研究,2003(3).
- [26] 赵美玲.建国以来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及政策变化[J].历史教学,1998(11).
- [27] 曹霞.试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曲折认识[J].中国现代史研究,2001(4).
- [28] 萧栋梁.建国以来我国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变迁与思考[J].求索,2000(6).
- [29] 刘雪明.1957—1965年党的个体私营经济政策述评[J].中国现代史研究,2001(2): 31-39.
- [30] 刘雪明.1966—1976年我国个体私营经济政策述评[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3).
- [31] 成保良.以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思想的形成过程[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7(1).
- [32] 黄世明.新时期党的个体私营经济政策的演变探析[J].毛泽东思想研究,1999(4).
- [33] 晓亮.私营经济发展的理论依据[J].经济界,1998(4).
- [34] 柯育芳.论1949—1956年党对私人资本主义政策的意义和启示[J].学术交流,2005(7).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National Policy for Individual and Private Economy

Cui Liping

(Business College of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31, China)